

麻省理工學院校園悲劇連年頻傳，近十一年裡有十一位學生尋短

(11 years, 11 suicides--Critics say spate of MIT jumping deaths shows a 'contagion')

--- 駐波士頓文化組提供---

根據波士頓環球報一項調查，與美國著名理工學院相較，一九九〇至今，麻省理工學院 (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) 學生的自殺發生率明顯偏高，比起排名居次的哈佛大學，超過百分之卅八；較發生率最低的學校，足足多出四倍。

二〇〇〇年的春季，MIT又陸續傳出三起學生尋短事件，一名大二女生自焚，一名校友在兄弟會所在地跳樓，還有一名休學在家自盡身亡。校長遂即指示成立專案小組，徹底檢視全校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。據小組成員之一，甫自該校畢業的艾瑞克·普洛斯基 (Eric Ploisky) 表示，「MIT學生自我了結生命的比例之高，實在不容忽視。」他在大三時，親眼目睹一名學生自殺，自此在校刊上就校園自殺問題發表文章。他認為這種自我了斷的行為已有蔓延的徵兆，校方卻漠然以對。他對學校毅然承擔酗酒致死的責任，但對自殺淡然處之的態度，感到十分驚訝。

美國疾病預防暨管制中心 (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) 和一些專家，通常以十萬分之一作為自殺發生率的計算基礎，MIT學生的自殺發生率為十萬分之 20.6，較全美十七至廿二歲年輕人的自殺率--十萬分之 13.5--多百分之五十三，比起全國大學生自殺率--十萬分之七，竟高達三倍。一般心理健康專家認為，以MIT這種不過只有四千四百名大學部學生數的規模來看，自殺的方式與比例實高得離奇。

尤其令人憂心的是，在十一名自殺者中，有八人不約而同的選擇了跳樓（包括宿舍及教室）的方式來猝結生命。普洛斯基甚至指出，有些同學早就接受自殺根本已成了MIT生活的一部分。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教授曼德琳·古爾德 (Madelyn Gould) 是美國研究傳染性自殺 (Suicide Contagion) 的權威，她認為採取跳樓自殺以求解脫的現象，MIT學生們逐漸習以為常，正悄悄蔚為校園文化的一環。可是該校校長查理士·衛斯特 (Charles M. Vest) 在給波士頓環球報的一封信面答覆中提及，他絕不相信MIT學生會將跳樓自殺視為輕描淡寫。在不幸事件發生後，他「親眼目睹同儕間的關愛、哀慟、歉疚之意溢於言表，或是致力檢討悲劇事件的成因等諸般舉措，在在說明了MIT學生絕不會認為自殺是件稀鬆平常的事。」

釀成學生自殺的原因不一而足，一般來講，逾九成與心理狀態有關。某些時候有人強忍下來，有些卻把持不住；然而校園裡的安全網比社會上要綿密得多，許多學生即使面對如山的壓力，尚不至於致命。「當心理方面極度低潮時，意味生命瀕臨著某個階段。既得獨立又要有成就，無可避免的成了各方強加在這些優秀學生身上的負荷。」哈佛大學副校長哈維·凡柏格 (Harvey Fineberg, Provost of Harvard University) 去年在擴充其心理健康諮商輔導業務時，做了以上的註腳。就若干心理諮商專家角度而言，與全美青年自殺率相比照，MIT十一年中有十一名學生自殺的現象不足為奇。但事實上，社會上許多精神痼疾尚未接受治療的人，根本不可能進入名校就讀，兩者難以相提並論。

MIT校方同時辯稱，該校學生特殊的結構比率，使得上述的一些比較不盡客觀，譬如一般來說，男性自殺率是女性的五倍；白人自殺率比其他少數族裔高得多。該校大學部與研究所總計約有九千八百名學生，男生大約占去三分之二。近十年來自殺的十名學生中，有七名是男生，女生則只有三名。但古爾德教授認為，這種論調不能卸責，甚至可以說是似是而非。她說：「以MIT這種規模的學校來講，每年一名學生自殺已經超過一般人口發生的機率，照說應該只有一半而已，更何況是這些大學精挑細選的優等生呢？」

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精神病學教授凱·瑞德費爾德·傑米遜 (Kay Redfield Jamison)，九九年出版過一本探討自殺的專書--"Night Falls Fast: Understanding Suicide"，她覺得許多

高等學府對處理學生心理上的問題，缺乏周全準備，有必要成立專案委員會，徹底檢討全美大學的因應之道。露西·科瑞斯伯·達·希爾瓦 (Lucy Cresop Da Silva) 在去年十一月跳樓身亡，成為十年來第八位循此模式終結生命者，此一悲劇過後，波士頓環球報向MIT及其他廿四所名校索取過去十年來的學生自殺資料，但許多學校怯於承擔責任，有些甚至不願提供相關數據，像是普林斯頓、史丹福、哥倫比亞、賓大、卡內基美隆大學、耶魯等校，不是一口回絕，就是閃爍其詞。在十二所提供資料的學校中，概以十萬分之一大學生與研究生作為計算自殺發生率的基數，絕大部分低於全美大學生自殺率平均值--十萬分之七，MIT以10.2，名列第一；就大學部學生來計算，高達20.6。有些學生素質優異的州立學校，像密西根大學，年齡十七歲至廿二歲的理工科學生，自殺率僅及2.5而已。超過平均值的學校，尚有哈佛大學--7.4。餘如霍普金斯大學--6.9、康乃爾大學--5.7。

大致來講，學校單位對校園裡學生自殺個案的研究，有限得很，也沒有足夠的經費與人員防患未然。像美國疾病預防暨管制中心的主席大衛·雪佛 (David Shaffer) 之類的精神病專家就認為，學生在校園內跳樓輕生的感染力強，校方有必要積極使出立竿見影的招數。幾年前，MIT為防範學生跳樓，特別重新改造了大樓的窗戶，為減低新生精神上壓力，還變更學業評分方式。學校心理輔導室也採取一些新作為，並允許公開討論自殺問題等諸般具體措施。

可是若干名校主管對此仍諱言如深，比如說耶魯，它不像MIT擁有學生輔導諮商的專責機構，其發言人聲稱：「就目前而言，這並不是當務之急。」還有幾所拒絕提供資料的學校覺得，追溯學生自殺的成因實無必要，另外像伊利諾州大學香檳校區 (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-Champaign)，在調查單位祭出公開檔案法 (open-records laws) 後，才勉予提供的資料。該校防止自殺小組主席保羅·約夫 (Paul E. Joffe) 指出，面對問題切忌感情用事，理出解決之道最重要。對那些大力鼓吹MIT勇於提供資料以及檢討現有組織架構的人而言，總希望轉變能獲致成效。

MIT 精神健康診所主任彼得·瑞克 (Peter Reich)，心不甘情不願的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，他不覺得有足夠證據顯示校園出現危機，自殺個案之間也沒啥關聯。據其概略估計，九五年以來，MIT 尋求諮商協助的案例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六十，雖然工作人員名額仍由十一名精神病醫生、三名心理學家、四名精神病社工、六名受過專業訓練的實習生外加一名精神科護士組成，但他仍認為現行編制尚可應付，也已竭盡所能，做了該做的事。去年一年間，超過十分之一的MIT學生在此尋求諮商輔導。一般在週日下午，學生只要走到這裡，就可以直接看門診，不過通常由資歷淺者處理。如果需要特約專家的話，至少得一個星期前預約。這種看診一般是免費的，對參加該校醫療保險的學生，學校還補貼校外私人看診的費用，每年可達五十次，每次卅五美元，從今年四月起，將調整至五十美元。

MIT 精神健康專案小組的學生副主席梅力斯表示，他目前在向學校進行遊說，籲請實施夜間門診，縮短約診時間。學生也不時抱怨，因為那些專科醫師，晚上在家縱然接到數起電話問診 (on-call)，卻不情願到學校與當事人專程約談，只是建議他們等到下一次辦公時間。梅力斯正計劃針對MIT學生精神健康狀況做一項問卷調查，據他去年接受學校輔導的親身經驗，第一位輔導員缺乏同情心，也未能針對問題適時提出建議；第二位是位女輔導員，四五趟看診下來，得到的印象是，對方僅是嘗試做出論斷，確定他是否需要接受長期治療，倒不是真能提供什麼助益，所以放棄此途，到波士頓另請高明。梅力斯觀察到，MIT 精神健康診所似乎只是著重在維持學生課業上的表現，卻不是針對改善精神健康狀態。該診所工作人員也不諱言，其使命就是，促使學生恢復發揮本身的潛能，儘早脫離看診；而不是探索病源加以治療。

至於自殺身亡者是否接受過學校看診，瑞克主任不願透露。據了解，去年春天自焚身亡的大二學生伊莉莎白·辛 (Elizabeth Shin，韓裔) 的確到過診所求助，雖然她曾向室友或一些人透

露過自殺的意念，卻不讓校方向其爸媽通報相關情節。如今她家人正準備興訟，控告MIT的疏失，所聘的律師認為，學校對伊莉莎白沒有提供適切的關懷，另一方面也應該與父母聯繫。學校拒絕對此公開評論，僅曾表示基於尊重已成年當事人的意見，所以才沒有通知其家長。但辛家委託律師指出，顯而易見的，當事人在校面臨重逾萬鈞的壓力，但校方知情後居然沒有任何反應，顯見學校的焦點只一味的強調課業優先。

當然事涉隱私權是很複雜的，對治療內容保密是校園從事治療極重要的一環，假如學生對此存疑，就根本不會再向學校尋求協助了。一位受僱於哈佛大學，負責處理醫療方面隱私權問題的律師黛安·羅培茲（Diane E. Lopez）說道：「法律上的確明文保障個人隱私權，除非被認定失去正常行為的能力，或是對他人產生威脅。」有時醫生會鼓勵學生向家長坦白，萬一事態緊急而學生仍抗拒時，那麼學校就必須當機立斷了。伊莉莎白辛的律師即認為，MIT應該參考哈佛的做法，適時告知家屬。但MIT資深副學生事務長羅伯·藍道夫（Robert Randolph, Senior Associate Dean for Students）卻以為，「這種事情的決斷總是見仁見智，如果擅自通知家長，有些學生將會非常憤怒，畢竟他們已經是年滿十八歲的成人了。」

哈佛大學在九五年時歷經一次自殺及謀殺事件，吸引來媒體廣泛的報導，之後該校重新檢討改進相關輔導機構。用於學生精神健康的費用從一百七十萬，調整到二百廿萬美元，並增聘七名醫護人員。去年十月，哈佛首度舉辦了一次全校性的會議，主要議題就是加強精神健康人員的在職訓練，以及有效傳達相關資訊，結果吸引了五百名教職員和三百五十名學生與會。學校方面深感振奮，考慮納入年度工作項目。

哥大古爾德教授還建議，MIT新生訓練時，可將校內負責精神保健單位列入新生校園參觀的行程，讓大家正視它的存在。MIT管理階層目前企盼其精神健康專案小組能找出癥結所在，以便對症下藥；但有些人存疑，在沮喪抑鬱腐蝕學生心靈的時候，當消沉畏縮日趨嚴重之際，或是壓力難以負荷的節骨眼上，學校又能做到多少呢？

MIT校長衛斯特表示，「為了充實學生生活品質、增進校譽以及讓學校蓬勃發展，我們將竭盡所能；但校園生活總是脫離不了緊張而忙碌，不論在MIT或是其他學校都是如此。」

--新英格蘭地區文教消息（錄自二〇〇一年二月五日 The Boston Globe）